



# 津沽烽火



作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、最早建立党的地方组织的地区之一,天津这座城市的红色印记清晰可见。河海上下,百多处红色革命旧址,讲述着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。

## 大苇塘的抗日传奇

又是一年丰收季。每到此时,第六埠村老支书张向和都会到子牙河边来走一走。1945年10月,他那不到20岁的哥哥张向远就牺牲在这片土地上——西青区第六埠村。这里位于大清河与子牙河的交汇之处,是东淀大苇塘东侧边缘的一个村庄。

1937年7月天津沦陷,日寇在天津实行高压殖民统治,对于进出天津的各条铁路、水道以及周边村镇都派重兵严密控制,特别是第六埠村所在的东淀。大清河、子牙河从这里穿过,水大的时候,东淀和西淀的水基本上能够连起来。那时候,从市区的三岔河口上船,往西过杨柳青、第六埠,一直开,能走到白洋淀。所以,第六埠一直是敌我双方争夺的重要区域。

天津市档案馆编辑研究部一级主任科员刘轶男介绍说:“1944年8月,冀中九分区静大县的政委阎思新和区长韩兴就来到这个第六埠村,进行武装开辟工作。他们首先发展积极分子,动员了第六埠村的许多进步青年,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。”

张向远烈士的弟弟、原第六埠村党支部书记张向和回忆道:“老娘跟我讲,我哥哥是把好手。出去打野鸭,谁也没他打得好,抬枪就打,收获最多。大哥结婚没几天,就响应党的号召当兵去了。”

在第六埠村的乡村振兴馆里,一组名单记录了张向远、强万明等十余名同志参加静大县第七区游击队的情况。同时还有张振永、张俊甫等七名同志参加抗联的往事。正是这两支抗日武装,在七区境内经常与日伪

军展开拉锯战。由于第六埠和附近的当城、水高庄、辛口镇靠近津浦铁路,是敌人的交通要道。张向远和战友们掐电线、扒铁道,给了日伪军沉重的打击。

1945年8月15日,日寇投降,津郊地区还有一些顽伪势力不肯投降,当城的王二楞伪自卫团就是这样的一股势力。

“这小子可混账了”,张向远烈士的老邻居、90多岁的郭金成说:“王二楞带着伪自卫团,专门欺负第六埠和水高庄。他为嘛总祸害这俩村儿呢,就是因为八路军经常上咱村里,找地下党开会来。”

历史档案对此也有明确记载。天津市档案馆的刘轶男介绍:“王二楞甚至还策划了一次假投降,妄图偷袭我们的军政干部,被我们七小队的队员们识破。经过激烈的战斗,王二楞被打跑了。他从此和七小队结下了大仇。”

1945年10月4日,王二楞获知静大县干部30余人到水高庄村开会的消息后,带领百余人和未投降的40多个日本兵,在拂晓时分把村庄包围。张向和说:“被包围后,张向远等20来个士兵藏在篱笆厕所里阻击。哥哥张向远为了掩护其他人撤退,自己却在敌人的机枪扫射下英勇牺牲。”

村民郝祥宝的父亲是那场战斗的见证者。他和村里的十几名村民,在上世纪60年代,把这段往事记录了下来。今天,那一张张泛黄的信纸,一枚枚红色印记,仍然诉说着那段逝去的时光。

张向远烈士的光辉事迹一直激励着弟弟张向和。数十年间,张向和始终追随着哥哥的脚步,一步一个脚印,带领乡亲们走上致富路。

第六埠村党委书记、村委会主任郝庆水说:“在老书记带领下,我们第六埠村在上世纪90年代就成为咱天津市的菜篮子基地。我们享受了物质生活的改善,更应该记住革命先

辈,让红色的基因代代相传。”

## 上池馆大药房的“红色秘密”

开设于1905年的上池馆大药房,曾是天津以经营西药为特色的药店,坐落在著名的官银号附近。钟桓芳在31岁时接手了药房的产业。他精通医术,通晓外语,善于经营。到上世纪40年代,上池馆大药房已经成为集医疗、制药、配药、中西药品零售批发于一身的大药房,在当时的天津医药界独树一帜。

随着日本侵华的脚步加快,北平(即北京)、天津相继沦陷。为打通从天津至晋察冀根据地的医疗物资采购渠道,冀中区党组织在天津大红桥一带建立了四个据点,秘密采购和运送医疗物资。对此,上池馆大药房多有贡献。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巡视员王凯捷介绍道:“在大红桥码头,大药房把药品装在船舱的底层,上面盖上布匹或是杂物。然后由我们的交通员护送,从子牙河逆流而上到达抗日游击区,乃至冀中抗日根据地。再经京汉铁路送到晋察冀根据地,为根据地反扫荡建立了卓越的功勋。”

上池馆大药房的行动引起了日军的警觉,大药房先后三次遭受了日本侵略者的搜查。钟桓芳的孙女钟玲玲说:“1942年春,当时有一个叫李德印的共产党人经常去采购一些药品和器械。和他同行的另一个人,在日寇袭击根据地的时候叛变了。所以日寇对祖父进行了抄家,将我的祖父钟桓芳、七伯钟振家抓进了宪兵队。他们拿出李德印的照片,问李德印去哪了?我的祖父说:‘我们做生意开门接客,不问去向。’”日寇只能释放了钟桓芳等人。然而他们并不死心,1944年春天,日寇又一次查抄了上池馆,这也是最惨烈的一次。钟玲玲讲道:“1944年4月5日,有一个叫焦香山的人,将组织给他购买药品的钱全

部挥霍了。为了逃避处罚,他投靠了日本宪兵队,泄露了上池馆大药房的秘密。宪兵队立刻查抄了大药房,带走了祖父钟桓芳和大伯钟振复。”

钟振复是药房的副经理。他在监狱里受尽了酷刑,但始终没有吐露半字。后人钟玲玲难过地回忆:“长辈说(逮捕)半年以后,有消息说我大伯被日本警犬活活地咬死了。家人苦苦寻觅,最后连我大伯的尸骨也没找到。”

爱子惨死,财产受损,但钟桓芳没有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。今天,钟桓芳的孙女钟玲玲仍保存着当年祖父写给她父亲钟振威的家书,寥寥几句,却记录了老人拳拳爱国之心:我一生,波折特多。我三次进日寇宪兵队,都系九死一生的……我这一生,对国家虽无贡献,但我从来亦未做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事,而我之爱国亦不后人也。”

在天津,这样不顾个人安危的“红色商人”还有很多。他们以籍籍无名之躯,做出挺起民族脊梁的壮举,彰显了这个城市不屈不挠的红色底蕴。

## 铁桥旁的硝烟

1948年深冬,位于今滨海新区宁车沽村附近的金钟河铁桥上弥漫着刺骨的寒风。这座钢铁大桥的争夺战,背后隐藏着解放战争中鲜为人知的壮怀激烈。

对天津革命颇有研究的王凯捷手捧地图有感而发:“当时这个铁桥战略地位是十分重要的。解放军从东北入关,要通过铁桥把军需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。另外如果占领铁桥,就能够迅速用兵切断塘沽和天津的交通联系。”

当时铁桥驻有国民党一个营的兵力,铁桥争夺战足足持续了一个夜晚。

宁车沽村民魏金华说:“我听我婆婆讲那天响了一宿的枪炮。第二天早晨老百姓去慰问解放军,发现有五个小战士已经牺牲了,老百姓就给抬回来。那前儿你上哪弄木料去打口棺材去?老百姓自觉地捐了五口棺材给这几个战士安葬了。”

如今,这五位烈士就安葬在潮白河马蹄窑。每年的清明和重大节日,魏金华一家都会赶到潮白河边祭拜烈士,和他们说说话,唠唠嗑,这一坚持就将近四十年。

与以往不同,魏金华这次前来祭扫,特意带来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的盛大实况录像,给这些长眠于地下的英烈看。正是他们在当年无畏牺牲、浴血奋战,才换来了今天我们的幸福生活。

百年前的天津,是先辈们追求真理,为之奋斗的地方。

如今的天津,正以崭新的面貌,站在新时代的潮头。天津觉悟社纪念馆、平津战役纪念馆、天津一二·九抗日救亡运动纪念馆、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纪念馆等一处处红色足迹,再次汇聚起天津这座城市的激情岁月。